

近代早期英国文雅观念的去道德化进程

蔡纪风

【摘要】礼仪书是欧洲宗教和宫廷社会的行为手册,其中包含的文雅观念能够体现近代早期西欧社会的价值选择与社会运行机制。15世纪以前的英国礼仪书以文雅举止为内在美德的体现,通过对举止的规训塑造贵族精神与良好人格。随着欧洲礼仪作品尤其是卡斯蒂廖内《廷臣论》的译介,英国社会认识到礼仪的伪装性与非道德性,将文雅视为自我塑造工具的设想使得德行合一的礼仪观走向瓦解。与此同时,都铎英国的社会失序使神定秩序观逐渐崩解,文雅举止的工具化特征使礼书对进一步重视他者感觉,考虑他人成为社交生活不可撼动的社会规约。尽管英国学者不断批判虚伪矫饰的礼仪风气,但也逐步肯定了身心分离和思想保留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创生出尊重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平等礼貌观。原本服务于等级秩序的文雅思想不断演进,促使人们放弃单纯通过举止判断德行的努力,最终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平等化。

【关键词】英国礼仪书;卡斯蒂廖内;文雅观念;平等

【作者简介】蔡纪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4.4.23~38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5批面上资助项目“近代中国东西礼仪互动研究”(项目批号:2024M75045)阶段性成果;由“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40307)资助。

欧洲自中古时期以来,礼仪书(courtesy books)的撰写和阅读不断引导、规范和教育人们的行为举止。这些书籍适应社会秩序和人际往来的需要,促使欧洲思想和社会向着文明的方向不断迈进。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视社交礼仪为艺术品,指出意大利人文主义精神存在于宴饮、节庆和社交之中,从而将礼仪问题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视野。^①此后学界对于近代早期礼仪史的研究逐渐丰富,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径是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从人际关系的变迁和自我抑制能力的提高考索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揭示出文雅举止与政治、社会变迁的密切关系。^②此后礼仪问题研究不断细化,尼克斯(J. W. Nicholls)率先将骑士文学与礼仪问题联系起来,利用多种手稿分析英国礼仪文本的缘起和发展脉络。^③夏提埃(Roger Chartier)更为准确地考察了文雅词汇的历史语义变迁,从而揭示出文雅观念具有社会区隔与社会传布两个对立面向。^④接续上述脉络,布莱森(An-

na Bryson)和阿尔迪蒂(Jorge Ardití)将文雅观念纳入英国史研究的论域,细致梳理了欧洲文艺复兴文雅观传入都铎英国知识界的具体过程,同时展现了英国文雅观念社会化进程的独特面貌。^⑤近年来,学者反思并突破文明进程的视野局限,推动礼仪与性别、巫术、族群认同和全球化等新问题相承接,使得礼仪史的研究取径更为多元。^⑥

尽管学界早已不再将欧洲礼仪发展视为从野蛮到文明的线性过程,也反省了埃利亚斯“历史心理学”对自控能力的过度强调,但学界在思考和阐述礼仪变迁时,仍着力于研究书籍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往往通过观察“文雅”与“野蛮”的分野来分析礼仪书籍如何推动社会和政治更革,不太留意礼仪文本本身的观念及其社会意蕴如何实现自我转型。从思想史和观念变迁的角度对近代早期英国^⑦礼仪书籍进行再解析,尤其是对礼仪书中道德要求的再梳理,可以发现从16世纪开始将礼仪当作获取名望的工具的看

法开始在欧洲流行。为了应对这些思潮,都铎社会的文雅和礼仪观也逐步褪去道德评断的色彩,礼仪的目的从培养绅士气质以契合等级秩序转换为主张礼德分离、将尊重带给所有人的平等礼仪观。^⑧这一取向使文雅观念突破了神定秩序的藩篱,推动了文明有礼的行为不断突破阶层的限制,最终促使礼仪规范走出基督教教育、走出贵族文化圈并且走出城镇,成为具有中立价值的社会生活方式。将礼仪书当作思想载体而非行动指南可以避免将礼仪研究简单化为概念的凿空演进史,能够展现英国社会对礼仪问题的思想论辩中蕴含着不可逆转的去道德化(amoralization)、社会化和平等化的历史进程。

古代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这一国家形象的建立和塑造离不开域外视野。英国文雅观念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进程影响深远:晚清首部中译西礼书是张德彝所译《朝眷会规》,首部西人辑译西礼书是傅兰雅所译《西礼须知》二种。这些礼书依据的文献都来自19世纪的英国。要理解近代中国有关礼仪与文雅的思想新变无法回避英国礼仪书籍观念变迁的历程。而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而言,欧洲文雅观念的核心意义不仅在于观念何以塑造社会,更在于观念何以限缩文化差异,将社会对举止的规范要求从特殊历史情境解放出来,转换为普遍适用的价值和逻辑。对于近代早期英国礼仪书籍文雅概念的思想史解读,一方面在于考索文雅的行为系统如何突破束缚实现自我转型并催生出新的社会文明意涵,也在于从欧洲礼仪转型中寻找中欧文明互鉴的启示,从而为近代欧洲礼仪观念的跨国流动和晚清西礼东渐的思想进程做好研究准备。

一、15世纪的文雅观念与道德意识

中古时期的骑士诗歌、贵族教育的行为手册(conduct books)和君主镜鉴(speculum literature)是近代早期英国礼仪书的主要文本起源。尽管拉丁文“礼仪”(courialis)一词在英格兰地区首先出现,^⑨但使用其他欧陆语言的礼仪写作传统比英文礼仪书更早臻于成熟。中世纪英国礼仪作品大多以长诗的形式写成,这些多存在于修道院中的规劝诗很大程度上是对《圣经》尤其是《传道书》中行为要求的沿用和扩

充。应用于宗教生活的“原型礼仪书”(proto-courtesy books)^⑩与15世纪以后的礼仪书不同,它们并非有关言行举止的教育,重点仍在培育宗教道德或塑造骑士精神。阿尔方斯(Petrus Alfonsi)的《教士守则》(Disciplina clericalis)、《礼仪》(Facetus)长诗等规训诗和礼仪书被当作拉丁文教材,贵族家庭中也存在家训类(parental advice)文本,在世俗社会中流传的则是以诺曼语和英语写作的礼仪作品。

英国早期礼仪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文明人之书》(Urbanus magnus)及其相关诺曼语写本。这部著作受到许多宗教规训的影响,除了圣本笃准则(Rule of St. Benedict)、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t. Victor)《论见习修士的培养》(De institutione novitiorum)这样的修道院指南外,许多写本也参考了加图对句诗(Distichs of Cato)。^⑪《文明人之书》的不同写本在13世纪多作为修道院藏本而得以保留,主要读者也是贵族家庭的牧师和其他年轻的神职人员。^⑫然而其中有关宗教仪轨的部分仍显次要,主体仍围绕身体、家庭和宴饮展开。相较于受到欧洲深刻影响的拉丁文礼仪作品,英国本土的《文明人之书》更侧重家庭生活,更有利于在贵族和商人家庭中被接受,因而成为14、15世纪英国礼仪书的范本与原型。

将礼仪和德性并列为基督信仰的核心,这些德性不仅包括基督教义中的智(prudence)、义(justice)、勇(fortitude)、节(temperance)四枢德(cardinal virtues),也包括古典哲学里的中庸(golden mean)、庄严(magnificence)等观念。“保持信仰的坚定是道德和礼仪的意义所在”“举止是德性的映照”等观念被许多早期礼仪书和规训诗采纳。如高文诗人(Gawin Poet)所作长诗^⑬使用“礼节”(cortaysye)描述上帝对人类自上而下的关系,与恩典(Grace)的意义相近。诗中的礼仪是世俗宫廷盛大场景推之于天国的具体呈现,意味着“上帝的宫廷”同样等级森严又庄严华美,其中的礼节也与贞洁、忠诚等内在品质相联系。^⑭《清洁》一诗说“缺乏礼节意味着内心污秽”,可见保持内心美德是言行举止所因循的标准,^⑮《文明人之书》则主张有礼有德就不会受到社会和人际纠扰的影响(第386-387行)。^⑯

文雅举止离不开自我抑制,《文明人之书》对自我抑制的要求远早于埃利亚斯对英国文明进程的设想。这些要求包括避免说出愚蠢的想法(第76-77行)、避免长篇大论令听众生厌(第94-103行),礼仪对生理机能如鼻涕、排泄的抑制要求也比较全面(第1083-1084行)。这些要求已经展现出行为应当考虑他人感受的思想倾向,但其主要目的在于捍卫社会等级秩序。文雅举止是为了向尊者展示敬爱和表达忠诚,并非为了自我塑造。因此,等级优先的原则是礼仪实践的关键,在行动中让位于尊者(第1331行)、餐食先提供给尊者(第2562行),甚至就餐时也要面向尊者。这些要求无不体现出“不尊重血缘和秩序的人最不值得被尊重”(第418行)这一文雅观,但尊者自身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他们不必拘泥于自抑原则而可以采取散漫和放松的心态。

15世纪的英国礼仪手册大多都以《文明人之书》为摹本,这些书籍以弗尼瓦尔(Frederic Furnivall)在1868年前后所收集编纂的英国礼仪合集最具代表性。^⑦这些礼仪童书和规劝诗仍带有鲜明的基督教色彩,除了将美德与礼仪相联系以外,还会强调礼仪莫非上帝的恩泽。美德与礼仪代表人的内外两面,儿童则外在野蛮无文雅,内在贫瘠无美德。因此不少童书的开篇都会提到天使与玛利亚的问答(《路加福音》1:28)并且排斥虚伪的假礼貌。^⑧礼仪规范将宗教虔诚纳之于内,不仅对上帝的虔诚是礼仪的要求,对神职人员的礼敬、尊奉乃至盲从也在文雅轨范之内。这些书籍虽题名礼书,但往往以美德教育为主,对于行为的规约不太具有系统性和思想性。

礼仪手册的撰写与贵族教育关系密切,英国贵族普遍将子嗣寄往亲属、宗教机构或是学校受教育,尤其是送往大贵族家庭担任助手(henchman)或成为养子女(ward),从而能够获得更为优越的教育和生活条件。在学徒教育(apprenticeship)的生活方式中青少年主要从事礼仪活动和日常起居的照管,^⑨致使文雅举止变得异常重要。面向幼童和少年的礼仪书为他们提供日常社交和生活的整体行为系统,包括如何起居、如何饮食、如何说和做等。正因如此,在贵族家庭中“使自己宜人”(make yourself agreeable)成为

各项礼仪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养成良好举止的儿童能够成为好仆佣从而得到贵族主人的喜爱,因此文雅举止带来“荣誉”(honour)和“幸福”(welfare)的观念在礼仪规训中常被强调。^⑩在等级社会中得到他人欣赏的核心是展现出与自身社会地位相符的行为,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77年出版的《礼仪之书》(*The Booke of Curtesye*)有具体的说明:“只有当人的行为与其社会等级相符时,人们才会认为他教养良好且诚实。”^⑪这一观念也成为评判举止合宜与否的关键。

礼仪手册继承中世纪晚期礼仪书的叙述逻辑,将礼仪教育视为家庭内部的职业教育,如罗素(John Russell)《教养之书》(*The Boke of Nurture*)强调良好和规范的举止是家庭内部各项工作的基本责任,尤其强调活动和宴会的程序及主持者的责任。^⑫有些礼仪规劝诗中甚至很少涉及信仰,如14世纪晚期的礼仪诗《城市礼节》(*Urbanitatis*)主要是关于与地位高者进行互动所需的身体礼仪,基督教教义只是作为点缀附于文末。^⑬许多童书将对待情爱和生死的教育也当作礼貌教育的一部分,甚至将乐善好施、珍惜时光、谨慎交友等人格养成也都当作文雅的一部分。^⑭可见文雅观念的范围并不恒定,职业责任、贵族特征、宗教意识和社会规范都对良好礼仪有所要求,文雅观念的不同面向也相互混杂。

经历了玫瑰战争的英国贵族意识到中央政府权势的薄弱和不可依恃。巨大的政治动荡破坏了封建王权的至尊性和效忠原则:封君领主朝秦暮楚,仆人暗算此起彼伏,就连都铎王朝的建立也离不开第一代德比伯爵托马斯·斯坦利(Thomas Stanley)阵前倒戈。到了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忠实”(faithfulness)仍然是匮乏的时代品质。^⑮因此,政治、社会和家庭内部秩序的驯服和整合变得十分紧迫,贵族对无条件服从的期待凝聚在礼仪规训之中。这致使书籍对礼仪教育的要求是形式(format)和规范(code),礼仪诗文直接向读者传达“该怎么做”,但几乎不涉及“为什么这么做”。如《亚里士多德字母歌》(*Aristotle's ABC*)等礼仪规训诗形式如同歌谣口诀,用最简单的词汇描述举止和态度,目的在于方便记忆和背诵,加强礼仪

举止的约束效果。

对知识的需求在15世纪的英国世俗社会逐渐建立,这是礼书编纂必须面对的问题。初创不久的英格兰印刷业不可能将书籍需求局限于宫廷内部,而必须考虑书籍的实用性。著名出版商卡克斯顿非常看重有阅读需求的新贵族和社会新阶层,同时也重视适合世俗社会使用的行为手册出版。^⑤他的《礼仪之书》同时满足了贵族与世俗的需要,而社会对行为准则、知识和技能的渴求促使他们更加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礼仪书对人际关系和家庭经营更加重视,文雅观念也往往分为个人与人际两个层面。^⑥卡克斯顿《礼仪之书》更看重文雅举止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利用良好礼仪来获取尊贵人士的青睐变得更为重要,^⑦对流畅阅读能力的提倡、对乐舞才艺的欣赏也包含在文雅的范畴内,^⑧这都体现出文雅举止的工具化特征已经初见端倪。

礼仪书对于不同阶层之间的互相接触和模仿心存警惕,尤其对突破等级和秩序的效仿嗤之以鼻,不断批评试图模仿贵族主人着装的侍者和仆从。^⑨衣着是等级秩序的物质表征,对衣着的要求是身份的直接体现,因此合宜的服饰关键在于实现社会等级的区隔而不是求荣取悦。相比对服饰的要求而言,礼仪规训诗并不认为文雅举止为贵族所独享。约作于1420年的《礼仪书》认为不管乡绅、约曼农甚至是身份更低微的人也都需要教养。^⑩认可教养的普遍需求实际上是文雅从美德转换为社会需要的关键一步。如果将文雅的举止视为美德的展现,那么其来源于上帝、归属于王权就是不言自明的,礼仪的实践形式也应该永恒不变,至少也是固定的。但在15世

纪的礼仪书中很难找到礼仪应该永恒不变的概念,卡克斯顿《礼仪之书》非常注重文雅举止的时效性,他强调“礼仪会变”,重要的事是模仿当下最有礼貌的人。^⑪虽然文雅举止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等级和尊卑,但却找不到将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出去的正当理由。

二、欧洲礼仪的非道德性问题及其英国回响

在一众欧洲礼仪书被译介以前,英国的礼仪(courtesy)观念与社会人际关系的连结并不紧密。欧陆礼仪书将优雅举止与社会生活统合起来,为英国社会及整个欧洲提供了新的文雅观念和社交规范。^⑫尤其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的《论男孩的文雅》(*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和意大利人文学者的礼仪作品(见表1)。在它们的影响下,英国出现了众多类似的行为手册(见表2)。这些礼仪书既不将礼仪当作固定的规范,也不再将礼仪的实践场所局限在贵族家庭和宫廷内部。新的英译礼书使拉丁文 *civilitas* 及其译词 *civilitie* 成为英国广泛流行的文雅语汇。*civilitie* 同时赋予了 *courtesy* 新的涵义并将其逐渐取代,曾经指代文雅举止的拉丁词汇如 *facetus*、*urbanus* 的贬义色彩也不复存在。^⑬

伊拉斯谟将良好举止与动物性表现截然对立,^⑭这一做法对文雅观念的系统化至关重要。虽然英国早期礼书也认为类似动物的行为相对粗俗,但人的动物性表现也可能具有正面意义,并不被直接判别为错误。^⑮随着“文明是从动物性和野蛮性中摆脱出来”的想法在欧洲的迅速推广,文雅观念开始具有明确的逻辑与思想线索,不再是可以因地制宜的风俗观。基督教神学和人文主义思想在批判行为动物性的问题上高度契合,与伊拉斯谟同时代的思想家认

表1 近代早期欧洲重要礼仪书的英译简表

礼仪书籍	作者	出版年	译者	英译年
《廷臣论》	[意]卡斯蒂廖内	1528	托马斯·霍比	1561
《论男孩的文雅》	[荷]伊拉斯谟	1530	罗伯特·惠廷顿	1532
《加拉泰奥》	[意]德拉卡萨	1558	罗伯特·彼得森	1576
《宫廷哲学家》	[法]菲利贝尔	1574	乔治·诺斯	1575
《文雅对谈》	[意]关佐	1574	乔治·派蒂	1581
《廷臣的艺术》	[意]杜齐	1601	爱德华·布朗特	1607
《文明守则》	[法]古尔丹	1670	黛西·斯特普尼	1671

识到如果礼节既有《圣经》为依据又合乎理性,那就没有理由将其局限在拉丁文法教育之内。^③《论男孩的文雅》虽是针对贵族儿童教育而作,但将文雅提升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四项内容之一。^④虽然良好礼仪仍被看作内心自我的再现和美德的延展,但伊拉斯谟已经流露出人的外在举止可以被塑造的观念。《论男孩的文雅》强调出身低微的人甚至农民也应该努力变得文雅,从而弥补“命运的恶性”(malignity of fate),毕竟“父母和祖国不可选择,才能与人格可以形塑”,^⑤这一将礼仪当作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工具的观念是把文雅举止当作社会表演的思想开端。

《文明人之书》提到“世界上没有比良好礼仪对你更有帮助的东西”(第15行),可见英国早期礼书已经认识到礼仪的工具作用。但这一主张带有道德和宗教修养的意味,并不针对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礼仪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其程序性中,由沃德(Wynkyn de Worde)发行的《待客之书》(*The Book of Keruynge*)把各类礼仪都当作机械流程,如“鹅肉必须与青蒜和酸果汁同吃”等具体规则比比皆是。^⑥这类要求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社交活动顺利进行,并非展现个人特质,更不在于塑造自我形象。

但是16世纪的欧洲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我形象可以被人为操纵和控制。最著名的例证是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提出君主不必真正具备慷慨、仁慈等美德,但必须让臣民感觉他具有这些品格,从而成为“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⑦具有类似文雅观念的礼仪作品是意大利人文学者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所著《廷臣论》(*Il Cortegiano*)。《廷臣论》将礼仪和优雅的特质限制于贵族范围内,认为礼仪只是贵族的自我约束,贵族身份是礼仪实践的“明灯”,使其他人得以区分行为的是非。^⑧故此,书中强调廷臣最重要的特质并不是“诚于中形于外”的“文雅”而是展现自身魅力的“优雅”(grazia)。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优雅”概念具有恩典义,意味着由上而下的赐予(favor),往往代表上帝赐予人、君赐予臣这类单向关系。可是卡斯蒂廖内将优雅的实践方向从“他者推向自我”转换为“从自我出发”,将作为品质本身的优雅转换为展现其他品质的方式,使

得优雅成为人与他人的“双向互惠”(two-way Grace)行为。^⑨如此,“优雅”成为一种可以习得的技巧,是廷臣甚至所有人都能具备的特质。这一想法使得本意在于塑造理想廷臣的理念很容易变成埋葬宫廷社会的工具。^⑩

在此基础上,卡斯蒂廖内创造性地重新阐述了“淡然”(sprezzatura)这一概念。所谓“淡然”,是指将自己的心思及所付出的努力都掩盖起来,所有行动和技艺都表现出漫不经心、浑然天成的感觉,从而人为制造出优雅的印象。“因为它使人感到,此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得如此之好,一定还有许多本领深藏不露,如果再让他辛勤努力,肯定会更加出类拔萃。”^⑪“淡然”的反面“矫揉造作”(affettazione)则意味着掩盖努力的失败和心机的暴露。这种藏巧于拙式的伪装和操弄既是一种欺骗,也是一种社会区隔,能够区分掌握“淡然”技巧的贵族和廷臣,以及不能看穿“淡然”手法的普罗大众。这就使得“淡然”技巧成为进入上层社会并获得认可的“入场券”,^⑫从而为自己赢得名声和荣誉。卡斯蒂廖内说“关注每个细节”是为了“留下深刻印象”,^⑬曾经用来展现内心价值的良好举止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游戏和表演,礼仪书也可能变成宫廷社会的游戏指南。^⑭

《廷臣论》中有关“淡然”的论述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英国社会从这部书认知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核心礼仪观。^⑮随后出版的欧洲礼仪书在这一问题上往往靡然向风,纷纷表明适应社会需要的伪装和欺骗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如意大利人文学者关佐(Stefano Guazzo)的《文雅对谈》(*Civil Conversation*)将卡斯蒂廖内的“淡然”技巧进一步深化,认为一定程度的作伪是文明的体现,为人处世应当“心虽异而面相同”(The heart altogether unlike, and the face altogether like to the people)。^⑯影响力堪比《廷臣论》的礼仪书《加拉泰奥》(*Galateo*)虽对取悦他人的社交技巧十分警惕,但作者德拉卡萨(Della Casa)承认讨巧和不诚实的奉承看上去是令人愉悦的习俗。^⑰《加拉泰奥》指出自我评价必须依赖他人的感受,他告诫“不可过度褒奖自己,因为那会使别人不高兴”,但也不可“错误地谦虚”,因为那会显得更加

傲慢。^⑤《论男孩的文雅》认为要展现出一种“不知道自己的教养如此之好”的状态,^⑥可见伊拉斯谟也同意应当拥有利用礼仪展现内在美德的能力,给人留下好印象,但他从未将自我隐藏转换为主动的社交技巧。文雅举止一旦与他人的观感连结,势必导致无法区别和评判真诚的歌颂与虚伪的奉承。

《加拉泰奥》对礼仪的道德性要求显著降低。德拉卡萨明言相较于其他美德,礼仪所能承载的价值更少,而文雅举止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发挥的作用则更为重要:“愉快而适当的礼仪激起他人对自己的怜爱,野蛮和粗鄙的行为使自己遭人痛恨。”^⑦对文雅的形象建构作用的强调促使中世纪礼仪传统中自我抑制原则的目的发生变异:早期英国礼仪书中的自我抑制表达的是对等级秩序和尊者的驯顺,虽然伊拉斯谟也提出“自抑必自年少始”,^⑧但他并不认为通过自抑来制造良好形象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他曾说为了所谓良好礼仪而压抑身体自然发出的响声是愚蠢的,^⑨即便要自抑也不可不顾生命和健康。但德拉卡萨认为要避免引起他人厌恶的联想,甚至上完厕所都不能当着他人的面洗手。^⑩对优雅举止所营造的社会效果的追寻已经致使追求卫生、舒适和教养的文雅目标被迫妥协。

文雅举止的工具化过程不仅是利用良好举止来展现自己具有美德的表象,甚至连美德本身也成为可被利用的对象:“廷臣必须善于利用这些品德,有时可以做个比较,以便吸引人们对某一品德的注意”,其目标在于“达到他想实现的效果”。^⑪《加拉泰奥》更是明确了礼仪实践不仅要服从等级秩序,还要遵守社会主流的习惯和观点,同时也强调个人行为对社会惯例的妥协。^⑫这三个维度使文雅言行直接转换为取悦他人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他指出“评价他人不应当考察其真实价值,就像使用金币时不应当计量其真实重量,而只应看其面额,也就是社会习俗加之于人的想象的价值”。^⑬深受《加拉泰奥》影响的法国礼仪书《文明守则》在坚持文雅的等级区隔的前提下也不得不认可他人的评判是礼仪合宜的关键,^⑭进一步导致文雅对真诚和美德的要求落空。《文明对谈》也将举止的道德性进一步削弱:“为了表达对社

交场合的尊重,你必须容忍你无法容忍的人。”^⑮甚至应对错误和非道德的行为视而不见,从而保证社会生活本身的顺畅。这些想法顺理成章地将文雅举止中的内在真诚和道德要求驱逐出去。

礼仪的表演性和工具性会淡化乃至破坏等级秩序。礼仪书中常认为对下级的优容是文雅的体现:“给予平级或下级的人以荣誉不仅不会使自己蒙羞,反而更显出礼貌也更值得尊重。”^⑯卡斯蒂廖内将“淡然”技巧限定在宫廷社会的小圈子中,在这个圈子中社交活动的规则优先于等级。例如在游戏和竞技中,不仅贵族没有逾越他人的权威,即便是君主,适时放下身段、舍弃君威才是优雅的表现。卡斯蒂廖内认为能够承受冒犯的君主才是伟大君主,^⑰《加拉泰奥》则指出在社交中应将他人当作邻居和朋友对待,而不看重其等级。《文明对谈》中的“对谈”(conversation)观念更加赋予了礼仪实践跨越阶层和等级的平等关系。^⑱社交活动的成功与否进一步凸显了他人的看法是判断文明有礼的决定性因素,^⑲至于评断者是贵族还是农民不再重要。

将外在的举止仪态(decorum)当作社会技巧的工具性观念源自16世纪个人主义思想所引发的“诚”(sincerity)的观念变迁,尤其是新教思想家如路德、加尔文都主张改变人是上帝肖像的普遍神学看法。人与上帝的相似性被否认导致四枢德中的智德(prudence)逐渐崩溃,人的外在与内在的分离获得肯定,外在行为对内心本我的保留和掩盖开始被社会习俗所接受。^⑳《哈姆莱特》中波洛涅斯一方面提醒雷欧提斯“对心真诚”,同时也指出“不要将他们表达出来”,^㉑可以看作16世纪末英国社会正面看待心行分离这一观念的注脚。行为与思想的分离即思想自我保留(mental reservation)的文化传统有极深的宗教渊源。《圣经》对于善意谎言和自我保留采取肯定态度(见《创世记》12:11-13;《路加福音》24:28),思想家乃至世俗社会很容易在《圣经》中找到自我掩饰的经典根源。正因如此,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往往采取伪装成天主教徒的方式避免遭受迫害,逐渐形成了信仰隐藏群体——尼哥德慕人(nicodemite)。这种情形在宗教改革早期就已经引起新教思想家的关注,

尤其遭到反对一切作伪的加尔文的强烈批判。^⑥

思想保留同样是英国社会常见的文化现象,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诸多纷争中也时常出现。在1535年对莫尔(Thomas More)的审判中,首席法官菲兹-詹姆斯爵士(Sir John Fitz-James)采取含混的说法来表明他可能并不支持判决结果。^⑦而这一问题真正引起英国思想界的巨大变动是在1595年耶稣会士索斯维尔(Robert Southwell)被审判时。为了不断渗透英国臣民乃至刺杀女王本人,英国天主教和耶稣会牧师如艾伦(William Allen)和帕森斯(Robert Parsons)都主张言语含混、回避和诡辩是符合教义的正当权利。为了彻底清除可能的伪装者,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法案要求所有在国外被任命为牧师的英国人在英居留40天以上就会被立即处死。^⑧面对残酷迫害,耶稣会士和其他非新教信仰者纷纷伪装自己,隐匿在天主教友人家中。在审判中,索斯维尔与法官都同意正义只能通过人的外在举止和言论判断而无法审查内心的秘密和意图。^⑨斯图亚特王朝前期有关信仰自我保留的正当性问题引起了诸多论战,^⑩尤其在火药阴谋后这一行为引起教俗两界的普遍反对。同时,一些有正当理由的思想自我保留又被认为是必要的。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通过看门人之口说出“含混其词”是以上帝之名叛国,^⑪足见此问题的矛盾性产生的思想余震。

世俗社会显然更能接受心行不一的举止。在无宗教的领域如在健康、荣耀、财产或美德的问题上进行自我保留在17世纪以后越来越被英国社会所接受。^⑫这一做法也顺理成章地在文雅观念中得到体现。布雷斯韦特(Richard Braithwaite)在《英国绅士》(*The English Gentleman*)中大力提倡社交生活中思想自我保留的必要性,认为绅士应该“有一张开放的脸和一颗封闭的心”(have an open face, but a shut heart)。他们既应受社会影响,又能隐藏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自我隐藏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保守自己的秘密,同时也可以守护自己的精神实质。^⑬布雷斯韦特已经注意到如果表里始终如一,在社会中保持真诚很容易导致熟人朋友掌握自己的秘密,从而获得压倒自己的权势。在他看来,保留和掩饰反而是一

种德性。将自我掩饰和思想保留正当化的观念在礼仪书中常有所体现,如皮奇姆(Henry Peacham)《完整绅士》(*The Compleat Gentleman*)强调对心思的节制是一种德性,他说“对思想的节制是诚实的基石”,^⑭与布雷斯韦特的文雅观基本一致。精神与行动相分离不断被世俗社会接受,这是将道德和价值评断从文雅举止中排除出去的思想根基。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越来越能洞察礼仪的伪装性。古奇(William Gouge)撰写的礼仪书《家庭责任》(*Of Domestic Duties*)揭示了礼仪可能是一种伪装。他虽主张一切举止都要讲礼貌,但这是因为礼仪代表正直,其本身就是目的。^⑮在这一基础上,他同时指出礼仪实践的巨大问题:“很多人心中对上帝没有一丝敬畏,为什么也能表现得彬彬有礼”,“为什么许多了不起的神学家都看起来质朴无礼”,“努力追寻上帝恩典的人同时追求礼貌不是在分心吗”?^⑯虽然古奇自我设问,却只能将良好礼仪归结于虔诚和正直。他既不能通过礼仪来判断虔诚与否,也无力表达既然礼仪无法甄别内在所以该被丢弃,只好解释说“既然不敬上帝的人可以举止有礼,那么虔诚的人不这么做不是更羞愧吗”,这样的回答显然无法让人满意。面对礼仪的伪饰,关佐曾说朋友之间最好不要讲究礼仪:“越是讲礼节,反而让人觉得你很不单纯。”^⑰当利用伪饰的礼貌成为社会常态,人们必须要提防彬彬有礼下隐藏的祸心了。

都铎英国的诗歌、文艺和戏剧常常讽刺宫廷的虚伪和矫饰的礼节,可以展现英国社会对“淡然”技巧的批判并非来自信仰问题而是反感宫廷社会的纨绔之风。^⑱《文明对谈》的英文译者谈及学习比自我形象管理更重要,“一旦绅士们都在通过伪装树立良好形象而不是诚实地学习,谁还有会能力治国?”^⑲散文家赫伦(Haly Heron)也有深刻反省,他发现自己无法判断讲礼貌的人是否正直:“谎言使人们的心变硬,他们灵巧的嘴巴满是掩饰和奉承的蜜语。”^⑳赫伦将礼仪的堕落归之于英国人从“奇怪的国家学习礼仪”,认为伪装的礼貌是将上帝的恩典当作恶习和狡猾的工具。在他看来,即使是慧眼识人的苏格拉底如今死而复生也无法通过语言和举止看清眼前的人

是否忠实。欧洲同样出现了批判礼仪系统性不道德的思想家,比如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格瓦拉(Antonio de Guevara)反对宫廷而向往乡村,他对朝臣礼仪的虚伪性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总是善意地向你脱帽致意的人其实在盼望你上断头台。^⑧一个新的词汇 *dissembler* 在 16 世纪初被创造出来,用来形容那些心行不一、行为虚伪的人。恰在此时 *sincerity* 一词也真正具备坦诚和真挚的意涵。^⑨礼仪的虚伪性问题已经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社会关注的议题。

社会规范的对人的抑制程度越来越高,技巧性礼仪和炫耀性礼典的风行已经不可忽视。面对这一情形,赫仑曾经呼吁地方执政官有义务辨明各种礼仪和礼貌举止的真伪。虽然从伊丽莎白时代到斯图亚特王朝前期,政治和社会力量对礼仪和道德的监管并未衰歇,教会对失德行为的惩戒范围也在逐步扩大。然而这些抨击和监管维持在地方社会层面,个人的失德行为例如酗酒、非婚生育等问题才刚刚

被国家确认为公共性议题,^⑩执政者主要面对的仍是由个人失德引起的社会失稳。由于良好举止是否真诚和有德难以被甄别,赫仑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面对这一情形,只能依照古奇的看法:即便礼仪被发现是一种伪装也不能因此破坏乃至放弃其本身的正当性。

三、去道德化与文雅观念平等转型

都铎宫廷贵族及宠臣对于欧洲礼仪书尤其是《廷臣论》非常了解。亨利八世的权臣沃尔西(Thomas Wolsey)亲自接见来访英国的卡斯蒂廖内;^⑪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以《论男孩的文雅》教子,自己则熟读《廷臣论》;^⑫担任多位都铎君主家庭教师的阿斯卡姆(Roger Ascham)根据意大利礼仪书撰写自己的教育手册(见表 2)。《廷臣论》甚至被时人称为英国绅士的第二部《圣经》。^⑬意大利礼仪作品打破了较为同质化的英法礼仪传统,知识群体对这些书的兴趣不断增强,其英译速度的显著加快即可佐证(见表

表 2 受欧洲礼仪书影响写作的英国书籍简表

欧洲礼仪书籍	英国礼仪书籍
《廷臣论》 <i>The Courtier</i> (1528)	T. Elyot, <i>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i> (1531) R. Ascham, <i>The Schoole Master</i> (1568) G. Harvey, <i>Castilio, Sive Aulicus and de Aulica</i> (1578) H. Peacham, <i>The Compleat Gentleman</i> (1622)
《论男孩的文雅》 <i>On Good Manners for Boys</i> (1530)	T. Elyot, <i>The Book named the Governour</i> (1531) T. Paynell, <i>The Civility of Childebode</i> (1560) W. Fiston, <i>The Schoole of Good Manners</i> (1595) R. Weste, <i>The Books of Demeanor</i> (1619) H. Peacham, <i>The Compleat Gentleman</i> (1622)
《加拉泰奥》 <i>Galateo</i> (1558)	Gainsford, <i>The Rich Cabinet</i> (1616) H. Peacham, <i>The Art of Living in London</i> (1642) N. Walker, <i>The Refin'd Courtier</i> (1663) O. Walker, <i>Of Education</i> (1673) J. Garretson, <i>The School of Manners</i> (1701)
《文雅对谈》 <i>The Civil Conversation</i> (1574)	Robert Greene, <i>Mamillia, a Mirrour</i> (1585) E. Spencer, <i>The Faerie Queene</i> (1590) L. Bryskett, <i>A Discourse of Civile Life</i> (1606) J. Cleland, <i>Hero-Paideia</i> (1607)

资料来源: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pp. 30–32, 78–79, 131–132; Burke, *The Fortunes of the Courtier*, pp. 83–84, 96–97; 王骁:《〈廷臣论〉在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的接受——兼论莎士比亚的廷臣观》,《国外文学》2023 年第 1 期; Woodhouse, *The Tradition of Della Casa's Galateo in English*, pp. 18–21; J. L. Lievsay, *Stefano Guazzo and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575–167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1, pp. 83–88, 96–100.

1),英译者也往往能够通过注释和补充说明等方式阐述自己的文雅观念。^⑩外国礼书中的新观念尤其是廷臣的理想形象、“淡然”的表演技巧、取悦他人的礼貌手法都造成了英国思想和文化的一系列变动,促使人们放弃通过举止评判德性的旧途径。

16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礼仪书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的《统治者之书》(*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统治者之书》及阿斯卡姆的《教师》(*Scholemaster*)、叶茨(James Yates)的《礼仪塔》(*Castell of Courtesie*)等同类礼书将行为规范纳入统治理想之中,代表了君主镜鉴体裁对英国贵族教育的深远影响。这些作品强调等级秩序,着力传承贵族传统和习俗,常饱含对都铎君主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赞颂。书籍主旨也往往是将贵族儿童培养成为具有美德、驾驭权势,从而能为公共服务的人。16世纪的英国本土礼书将文雅当作“粗俗哲学”和“类似道德”的思想仍然普遍,如菲斯顿(William Fiston)仍坚持礼仪是心灵的再现,认为“值得尊重的不是衣着的光鲜而是内在的德性”,^⑪这些为儿童准备的礼仪书籍始终强调内外一致、德行统一,^⑫而不太涉及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更难以适应英国社会失序和城市生活的新变化,这可以解释都铎英国虽然具有明显的排外心态,但并没有影响意大利礼仪观念的传播。

将社会运行与宇宙本质相联系,由天国中的神及诸天使直到人间的众多生物和元素共同构筑起的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是文艺复兴秩序观的基本思维架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对应关系不仅静止、理性而且不可改变。^⑬天上的太阳对应着人间的国王,又同时对应着兽中之狮、禽中之鹰和花中之玫瑰。这一神定秩序使得社会等级正当化且永恒成立,以等级差异为标志的秩序观与理想社会形态也在诸多礼仪书中被着重强调。

可是社会失序现象正在发生,现实与理想秩序的差距越来越大。都铎英国的贸易发展、人口增加、物价上涨、修道院被遣散和圈地运动等种种新因素都导致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都铎宫廷规模的扩大使得围绕伦敦的宫廷职位和工作机会增多。而经济富足的乡绅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利用领主的

提名权异地当选议员的情况越来越多,使得议会政治出现“乡绅入侵”。这些并非本地选民的外地乡绅虽由贵族举荐却不与其建立真正的政治同盟,使得乡绅的社会力量不断增强。^⑭与此同时,贵族爵位也发生了“荣耀膨胀”,骑士、从男爵乃至更高等级的贵族爵位先后开始售卖。爵位可以购买使得社会对贵族地位的尊崇不断降低。这些新变都导向社会流动性的显著提高。

乡绅和商人推动了伦敦“社交季节”的兴盛,1590-1620年间已经有半数以上的贵族和超过500名乡绅时常涌入伦敦,很多人有了固定居所。^⑮他们为了接近宫廷、参与各类社交活动,急于穿上华贵的服饰,甚至宁愿用四五亩良田换取三四箱衣物。^⑯穿上华服的人们忘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穿错衣服所导致的身份僭越也层出不穷,政府虽然相继订立禁奢法和服饰法,但其维护社会身份区隔和等级关系的能力不足,成效有限。^⑰因为对华丽服饰和奢侈消费的追求实际上是对更高等级的社会身份的追求,更是对认同的追求。这些追求使得“向上爬”成为社会普遍心态,华服与美食也因此从中等阶层不断下移,使得大众消费市场成长为新的公共空间。^⑱在这一情势下,政府和教会对傲慢和奢侈的道德批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聚集在伦敦的贵族和乡绅频繁地交际与互相拜访,社会新贵们意识到无论是血缘、荣耀还是信仰都不如与王室和大贵族建立密切交际来得实在。这些既空虚又浮躁的交际宴饮引发学者的批评,^⑲但社会流动性的显著增强使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接触各类陌生。默认陌生人比自己的社会地位更高,在行为举止中表达更多尊重是稳妥的社交手段。如此一来,能够实现等级区隔的差异化行为数量减少,但行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加,^⑳通过礼仪和举止越来越难以判断人的身份和地位了。

但是对于文雅观念而言,如何看待社会失序恐怕比失序本身更为重要。人们对于社会等级判分不再仅凭出身或血统组成的细致层级,而是简化“上下”“贵贱”“贫富”这类二元心理格局(*piebald mentality*)。^㉑被他人视为“较好的那群人”(the better sort)所

需要获取的身份范围变得广泛,托马斯·史密斯(Sir Thomas Smith)虽然仍坚持基于血缘的秩序观,但他承认绅士身份在英国已经变得廉价:“只要你不用付出体力劳动还能负担各项开支,并且有彬彬有礼的仪容,你就会被称作是主人。”^⑧人们开始使用更粗糙也更不精确的词语来描绘他者的地位和影响力,粗俗还是文雅也成为等级秩序判分灵活的标准。相较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等级之间的文化距离更容易被弥合,当文雅逐渐成为上流社会属性的代名词,掌握文雅的举止就等同于获得高等级的身份符码,这导致年轻人对礼仪书的需求越来越大:剑桥大学里随处可见卡斯蒂廖内、关佐和德拉卡萨等人的礼仪作品。^⑨这意味着掌握礼仪的伪装技巧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人越来越多。

在考量何种举止应该被视为文雅时,礼仪书籍难以继续将等级和秩序放在首位,“符合身份”逐渐让位于“他者感觉”。尽管贵族性的培育仍是整个都铎时代行为书籍的主旋律,但是礼仪的适用范围和对他人感受的重视显著增加。受到欧洲礼仪书影响的新编儿童礼仪手册开始关注儿童本身,不再将受众限制为贵族家庭的学徒,礼仪内容对约曼农和商人家庭同样适用。^⑩埃利奥特的《统治者之书》虽然强调贵族德性,但将使自己被他人接受的特质当作“亲善友好之德”(affabilitie)。在他看来具有“亲善之

德”应成为贵族身份的重要品质,因为有礼貌的人“像是身上能散发香味,让人精神振奋,使人对你拥戴和热爱”,^⑪可见亲善友好的社交方法已经被内化为人的德性。皮奇姆的《完整绅士》更典型地表现了道德价值的分化:不仅君主是道德的化身,贵族阶层中的各个成员也都可以象征道德的各种侧面,更重要的是道德具有公众利益的意蕴。^⑫这就使得文艺复兴时代“神定秩序”的集体思维出现裂痕,公共利益和社会中的他者感觉逐渐被内化为美德的组成部分。

真诚社会幻想的崩溃是推动礼仪去道德化转型的关键原因之一。关佐曾说一个所有人都无需礼仪的遮饰而彻底真诚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让所有人都无礼其实是在让他们守另一种礼”。^⑬菲利贝尔(Philibert de Vienne)撰写的《宫廷哲学家》(*Le Philosophe de Court*)进一步指出知行合一不仅不切实际甚至是“野兽和无知者”的行为,因为取悦和讨好既不是欺骗也不是哗众取宠,它不仅是善意善举更代表了对世界和每个人平等尊重。^⑭菲利贝尔将情感和意识也当作需要压抑的对象,其目标旨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承继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视他者感觉的想法,菲利贝尔明确说出端庄有礼是要让“所有人都舒适”。^⑮这一想法不仅对文雅观念的普遍适用性转型至关重要,同时彻底放弃了礼仪所应具备的任何道德要求,可以看作文雅观念去道德化

表3 16-17世纪欧洲重要礼仪手册中的礼—德关系论述

礼仪书籍	礼—德关系
[荷]伊拉斯谟《论男孩的文雅》	礼仪是粗糙的哲学,是外在的诚实
[意]卡斯蒂廖内《廷臣论》	美德是糖衣炮弹
[意]德拉卡萨《加拉泰奥》	礼仪即便不是美德,也是一种近似于美德之物
[意]关佐《文雅对话》	为了被他人接受,我们必须隐藏自己的想法并尽可能地模仿他人
[英]埃利奥特《统治者》	掌握能够获取他人喜爱的“亲和力”既是一种智慧,也是最适当的行为
[法]菲利贝尔《宫廷哲学家》	做让所有人都感觉舒适的事情就是美德
[英]布雷斯韦特《英国绅士》	亲和力和每个慷慨心灵都值得拥有的美德
[英]皮奇姆《完整绅士》	对思想情感的节制是诚实的基础
[英]洛克《教育漫话》	取悦他人等于尊重他人

资料来源:Desiderius Erasm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in J. K. Sowards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pp. 273-274; 卡斯蒂廖内:《廷臣论》,第317-318页; Della Casa, *Galateo*, p. 2. George Pettie trans,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Steeven Guazzo*, Bk. 1, p. 47; Philibert de Vienne, *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urt*, pp. 107-108; Richard Braithwaite, *The English Gentleman*, p. 10. 文中已经出现过引文的不再重复。

的初步完成。

当礼仪的作伪成分无法被证实而其本身的正当性又无法被瓦解时,默认人人都有好意、都值得尊重是社会行为的最佳选择。将舒适和尊重带给每个人的想法使虚假的礼貌也纳为美德,正如培根(Francis Bacon)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所言,“道德哲学构筑内在的善,文雅知识(civil knowledge)只要求外在的善。对于社会而言,外在的善就已经足够了”。^⑩这一理念将欧洲礼仪书中伙伴(周围的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他者感觉的重视进一步延展,从而促使礼仪的目的转换:将取悦看作尊重从而符合公共利益,解决了礼仪伪装性的道德困境。

17世纪以后,英国社会对礼仪非道德性的反思与挞伐并未衰歇,其中既包含有洞见的思想家对礼仪伪装性的批判,也包括英国新教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的拒斥,还包括反对教会的人对宗教乃至一切形式优雅举止的抗争。^⑪面对士绅阶层的扩展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礼仪书籍基本接受了以尊重所有人为基调的文雅观念,同时进一步扩大礼仪的适用范围。当思想保留和谨慎的言谈举止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礼仪的非道德性问题随之常被忽略,所谓“谨慎行事是美德和良好礼仪的母亲和护士,从而将秩序与得体带入到每个行动中”。^⑫社会生活中的缄默、含混、掩饰甚至是欺骗都会被视为合宜的举动,即使是批判浮华、追求美德的培根也承认“举止是心理的外衣,外衣就应该有外衣的样子,应该剪裁合宜,顺应时尚;展现美好,隐藏缺陷”。^⑬

让他人感到舒适会被认为有德,进而可以获得社会荣耀(honour)。荣耀的获得常具有竞争性,而文雅举止恰好能将潜在的威胁性遮蔽起来。随着社会失序和观念更革,荣耀从社会对宗教美德和血缘秩序的维护转变为自我价值的外在评价,借由信仰或血缘而产生的荣耀观式微,“荣耀”变为自我施予和自我经营。获得他人承认的“公共敬意”(public esteem)越来越成为荣誉与德性的社会来源。^⑭正因如此,学者如洛克(John Locke)对德性的理解顺应社会的流行用法,不再执着于对德性概念的诠释,也不再严格区分价值与教养。^⑮曾经各有意蕴又互连接接

的德礼观变得相互混杂了。

除了举止和服饰以外,语言和修辞同样体现了神定秩序观的逐步式微。思想保留以诡辩和含混的修辞方式展现出来,昆体良(Quintilianus)雄辩术中的“放大”(amplification)方法重新获得英国学者的重视,在言谈中通过“拉伸”真相来唤起情感的修辞法都被铎思想家们接受,他们甚至主张通过加强或者削弱问题的道德性来煽动听众的情绪。有关“放大”方法与“淡然”技巧的争论很相似,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认为修辞模糊的技巧强大到能让一切关于美德与恶俗的真诚讨论排除在外。^⑯语言模糊、举止伪装与思想保留产生的社会效果正是针对外在举止进行道德评判的失效。

试图使礼仪规训逐步脱离宫廷或宗教的具体场域,使之被各阶层普遍接受,理应放弃对他人行为的价值判断和强烈的道德感。洛克揭示了礼仪和教养习得的目的是对所有人表达尊重,这代表了文雅观念社会化的初步实现及其彻底的去道德化。他在《教育漫话》中将“取悦他人”和“尊重他人”基本等同,认为有教养的人一是不冒犯他人的心态,二是要用最合适和宜人的方式表现这一心态,^⑰从而同时使自己和他人都感到舒适。这些观念是对16世纪欧洲礼仪书中许多观点的继承和推展,使人的行为成为社会关系的“润滑油”。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举止为适应社会的要求而产生的委曲求全被完全正当化:“优雅总是让人高兴的,它总是产生于事与心的协调之中,这就使得心虽不愿却也不得不符合社交时机的要求。”洛克不仅无视中古以来的礼仪传统中对矫揉造作(affectation)的长期批判,还将其当作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直言“外在行为与内在思想永远不会统一”,^⑱致使通过外在礼仪辨别内在道德的实践方法彻底失去意义。洛克的文雅观实现了中世纪晚期以来对外在礼仪体现内在价值的重构,打破了知行合一的精神纽带,从而取消了对行为举止真诚与否的道德判断,创生出更接近西方现代社会的文明观。

16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意识到人无法脱离群体过上与社会隔绝的隐居生活,因此才将道德评价从

对行为举止观察中排除出去。相较于评断单个行为的是非,尊重他人并积极地参与社会被当作更道德、也更值得鼓励的生活方式。^⑩在此基础上,文雅观念的政治性得以凸显:粗俗的人不仅难以获得政治威望,更会遭到社会生活的驱逐。这甚至致使文雅举止逐步成为取得社会认可单一标准的倾向,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指出17世纪的英国人如果刻意强调血缘和秩序反而成为一种不文雅的表现,进而沦为他人嘲弄的对象。^⑪一旦平等的文雅观成为社交生活的唯一门槛,那么对生活方式的共同要求很容易形成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结论

虔敬地为王室和国家服务的绅士理想是16世纪英国人普遍的政治追求,因而都铎社会对《廷臣论》的接受是将其当作古典理想的化身。相较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主张以狡猾的手段影响君主,都铎英国的廷臣仍然推崇忠实与服务。^⑫在这一背景下,卡斯蒂廖内在英国人看来更像是埃利奥特而不是马基雅维利。虽然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卡斯蒂廖内笔下的廷臣形象已然负面化,但这一文化防御机制力图在虚伪矫饰之中维持公忠体国的精神面貌,使得原本处于接受方的英国文化传统在摆脱意大利人文主义中虚浮一面的基础上,仍然肯定文雅举止的正面意义。贵族社会的开放性使得文雅观念的扩散成为可能,商人阶层也许并非都乐意变成地主和贵族,但却无不试图模仿体现教养的绅士礼仪和生活方式,呈现出“中层模仿上层,下层模仿中层”的社会心态。^⑬来自国王和贵族宫廷的文雅观在其社会化进程中自我转型,使人们在无法认知他人的身份和地位前始终采取更为谦恭有礼的社交技巧。在公共场所对所有人“始终保持像仆人对待主人那样敬仰和尊重”,^⑭这使得主仆关系与平等关系互为表里,等级秩序在生活中呈现为并不真实的平等人际关系。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 politeness 所代表的礼貌概念逐渐成为一种更为普遍、完全失去道德价值判断、对社会各阶层一视同仁的平等礼貌观。其重要代表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Philip Stanhope)所作《致子家书》将礼貌策略化与技巧化的

理念奠定了现代社会对于仪态管理和形象塑造的基本预设,^⑮其中许多想法在16世纪的礼仪书中已经初露端倪。这一观念变迁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思想家们直面礼仪的伪装性和工具化问题,创造性地揭示了心行分离在社会运转中的必然性与正当性。他们把公共利益也看作美德,主张每个人都值得尊重,从而将虚假的礼貌也当作符合道德的社会要求。与此同时,文雅的去道德化也会导致平等观念跃出政治秩序的范畴,使原本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不得已被发明的“药”转换为终极社会理想状态的“粮”,^⑯使平等观念有可能沦为逞私欲的武器,从而可以被用来进行社会斗争。

中国儒家经典《礼记》认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⑰这段话对于中国思想的演进极为重要,使得知行合一始终代表古代中国士君子的典范。《礼记》对于诚意的要求并没有错,可却高估了普遍意义上人的洞察和辨别能力:“君子”视“小人”真的能“如见其肺肝然”吗?欧洲文雅观的思想演进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取径,获得了出人意料的社会效果,但同时亦不无缺憾: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值得被平等地尊重吗?两种不同进路的文雅观在晚清中国通过西礼译书相交汇,这一观念的国际流动不断塑造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和道德转型,也推动了晚清民国人际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变化,这些重要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注释: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6页。

②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③ Jonathan Nicholls, *The Matter of Courtesy: A Study of Medieval Courtesy Books and the Gawain-Poet*, Dover, N. H.: D. S. Brewer, 1985.

④ Roger Chartier, "From Texts to Manners, A Concept and Its Books: Civilité between Aristocratic Distinction and Popular Appropriation," in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⑤ Jorge Ardit, *A Genealogy of Manners: Transforma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⑥ Jacques Carré ed., *The Crisis of Courtesy: Studies in the Conduct-Book in Britain, 1600-1900*, Leiden: Brill, 1994; Peter Burke et al. eds., *Civil Histories: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Keith Thom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Kathleen Ashley and Robert L. A. Clark eds., *Medieval Conduct, Medieval Cultures*, Vol. 2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Jennifer Richards eds., *Early Modern Civil Discours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Keith Thomas,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⑦ 本文所说英国是指英格兰。近代早期是指15-17世纪,但不可避免会论及之前和之后的重要礼仪文献。

⑧ 本文所说的文雅观念是指中世纪出现并持续至今的系统化的礼仪举止要求及其社会 and 道德意涵,包括中世纪晚期就存在并沿用至今的文雅用语 *courtesy* 和 *manner*, 16、17 世纪的主要文雅用语 *civility* 以及在 18 世纪以后盛行的 *politeness* 和 *etiquette* 等概念,文中“礼仪”与“文雅”二词一般不作区分,或用英文原文标识。这些文雅概念意蕴丰富又各有侧重,简而言之: *courtesy* 强调等级关系,尤其是下对上的单向服从; *manner* 强调行为举止的系统,无关德性和品格; *civility* 的意涵与内在品质关系密切,强调与野蛮相区隔的文明和教养; *politeness* 则强调社会生活中的交际关系和形象,与中文“礼貌”一词最为接近。

⑨ R. E. Latham, *Revised Medieval Latin Word-List from British and Irish Sources*, London: British Academy, 1983, p. 126.

⑩ Jonathan Nicholls, *The Matter of Courtesy: Medieval Courtesy Books and the Gawain-Poet*, p. 31.

⑪ Rosamond Parsons, "Anglo-Norman Books of Courtesy and Nurture,"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44, no. 2(1929), pp. 388-389.

⑫ Fiona Whelan, *The Making of Manners and Morals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The Book of the Civilised M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61.

⑬ 指存在于14世纪晚期同一写本、被归为同一作者的四

首头韵长诗:《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珍珠》(*Pearl*)、《清洁》(*Cleanness*)和《忍耐》(*Patience*),此外有时也包括《圣艾肯瓦德》(*St Erkenward*),这些长诗的作者被统称为高文诗人。

⑭ D. S. Brewer, "Courtesy and Gawain Poet," in John Lawlor ed., *Patterns of Love and Courtesy: Essays in Memory of C. S. Lewis*,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66, pp. 57-59.

⑮ "Cleanness," in Malcolm Andrew and Ronald Waldron eds., *The Poems of the Pearl Manuscript, Pearl, Cleanness, Patience,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6th ed., Liverpool: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Press, 2013, p. 29.

⑯ Fiona Whelan et al eds., *The Book of the Civilised Ma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Urbanus Magnus of Daniel of Beccles*, London: Routledge, 2020. 引用的诗文行数随文注出,以利阅读。

⑰ 这些礼仪作品合集包括 F. J. Furnivall ed., *Early English Meals and Manners*, London: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1868; F. J. Furnivall ed., *The Babees' Book etc.*, London: EETS, Original Series, 32, 1868; F. J. Furnivall ed., *Manners and Meals in Olden Time*, EETS, OS, 1867; F. J. Furnivall ed., *A Booke of Precedence*, London: EETS, Extra Series, 8, 1869 等。合集中一些礼仪书、礼仪诗的确切写作时间仍有争议。

⑱ "The Babees' Book or A Little Report of How Young People Should Behave," in Edith Rickert eds, *The Babees' Book: Medieval Manners for the Young: Done into Modern English from Dr. Furnivall's Tex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08, p. 5.

⑲ Nicholas Orme, *From Childhood to Chivalry: The Education of the English Kings and Aristocracy, 1066-1530*,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84, p. 51.

⑳ "Of the Manners to Bring One to Honour and Welfare," in Furnivall ed., *Manners and Meals in Olden Time*, pp. 34-35.

㉑ *The Book of Curtesye*, London: By William Caxton, 1477, STC 3303, 2A.

㉒ John Russell's *Boke of Nurture*, in Furnivall ed., *Early English Meals and Manners*, pp. 48-53.

㉓ "Urbanitatis," in Furnivall eds, *Manners and Meals in Olden Time*, pp. 13-15.

㉔ "Proverbs of Good Counsel," in Furnivall ed., *A Book of Precedence*, pp. 68-70. "How the Good Wife Taught Her Daughter," in Edith Rickert eds, *The Babees' Book: Mediaval Manners for the Young: Done into Modern English from Dr.*

Furnivall's Texts, p. 33.

②5 M. E. James, "English Politics and the Concept of Honour, 1485-1642," in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57.

②6 张炜:《社会变迁的催化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媒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9页。

②7 "How to Rule One's Self and One's House," in Furnivall ed., *A Book of Precedence*, p. 71.

②8 The Book of Curtesye, 3B.

②9 The Book of Curtesye, 8A—8B.

③0 "Occleve Against Wide Robes and Long Sleeves," in *A Book of Precedence*, pp. 106-108.

③1 "Book of Courtesye," in Edith Rickert ed., *The Babees' Book*, p. 79.

③2 The Book of Curtesye, 11A.

③3 Lewis Einste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Eng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pp. 60-61.

③4 John Gillingham, "From Civilitas to Civility: Codes of Manner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2(2002), pp. 281-283.

③5 Desiderius Erasm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in J. K. Sowards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pp. 274-275, 277.

③6 The Book of the Civilised Man, p. 106.

③7 Dilwyn Knox, "Erasmus' De Civilitate and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Civility in Protestant Europe,"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Vol. 86(1995), pp. 36-37.

③8 Desiderius Erasm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in J. K. Sowards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p. 273.

③9 Desiderius Erasm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in J. K. Sowards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p. 289.

④0 The Book of Keruyng, London: Enprynted by Wynkyn de Worde, 1508, STC 3289, sig. B1-r.

④1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4页。

④2 卡斯蒂廖内:《廷臣论》,李玉成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1页。

④3 Ita Mac Carthy, *The Grac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58.

④4 Jorge Ardit, *The Genealogy of Manners*, pp. 101-102.

④5 卡斯蒂廖内:《廷臣论》,第50页。

④6 Eudardo Saccone, "Grazia, Sprezzatura, Affettazione in the Courtier," in Robert W. Hanning and David Rosand eds., *Castiglione: The Ideal and the Real in Renaissance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9-60.

④7 卡斯蒂廖内:《廷臣论》,第110页。

④8 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吴明波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03页。

④9 John E. Mason, *Gentlefolk in the Making: Studies in the English Courtesy Literature and Related Topics, from 1531-177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5, pp. 10-11.

⑤0 George Pettie trans,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Steeven Guazzo*, London, 1581, Bk. 1, STC 12422, p. 47.

⑤1 Della Casa, Galateo of Maister John Della Casa, Archbishop of Beneventa. Or Rather, A Treatise of the Maners and Behaviours, it Behoveth a Man to Use and Eschewe, in His Familiar Conversation, trans. by Robert Peterson, London: Printed for Raufe Newbery, 1576, STC 4738, p. 44.

⑤2 Della Casa, Galateo, pp. 37-38.

⑤3 Desiderius Erasm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in J. K. Sowards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p. 279.

⑤4 Della Casa, Galateo, p. 3.

⑤5 Desiderius Erasm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in J. K. Sowards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p. 285.

⑤6 Desiderius Erasm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in J. K. Sowards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p. 275.

⑤7 Della Casa, Galateo, pp. 5-6.

⑤8 卡斯蒂廖内:《廷臣论》,第108页。

⑤9 Antonio Santosuoso, "Giovanni Della Casa and the Galateo on Life and Success in the Late Italian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Vol. 11, no. 1, 1975, p. 6.

⑥0 Della Casa, Galateo, p. 23.

⑥1 Antoine de Courtin, *The Rules of Civility, or Certain Ways of Deportment observed in France, amongst all Persons of Quality*,

up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 1671, p. 52.

⑥2 George Pettie trans,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Steeven Guazzo*, Bk. 1, p. 46.

⑥3 Desiderius Erasm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in J. K. Sowards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p. 286.

⑥4 卡斯蒂廖内:《廷臣论》,第198、312页。

⑥5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p. 54.

⑥6 曲卫国:《英国礼貌变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264页。

⑥7 John J. Martin, "Inventing Sincerity, Refashioning Prude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Individual in Renaissance Europ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2, no. 5(1997), pp. 1317-1323.

⑥8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1幕第3场,《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⑥9 Carlos Eire, *War Against the Idols: The Reformation of Worship from Erasmus to Ca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42-243.

⑦0 William Roper, *The Life of Sir Thomas More*, Irving, TX: Center for Thomas More Studies, 2003, p. 54.

⑦1 "An Act againste Jesuites Semynarie Priestes and such other like disobedient Persons(1585: 27 Eliz. I, c. 2)," in *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4, London: Dawsons of Pall Mall, 1963, p. 706.

⑦2 Pierre Janelle, Robert Southwell, the Writer: A Study in Religious Inspiration, New York: Sheed & Ward, 1935, pp. 81-82.

⑦3 Peter Milward, *Religious Controversies of the Jacobean Age*, London: Scholar Press, 1978, pp. 82-86.

⑦4 莎士比亚:《麦克白》第2幕第3场,第132-133页。

⑦5 Perez Zagorin, *Ways of Lying: Dissimulation, Persecution and Conform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98-199, 219.

⑦6 Richard Braithwaite, *The English Gentleman*, London: Printed by John Haviland, 1630, pp. 135, 280-282.

⑦7 Henry Peacham, *The Compleat Gentleman*, London: Printed for Francis Constable, 1622, pp. 194-195.

⑦8 William Gouge, "Of Parents Teaching Their Children Good Manner," in *Of Domestic Duties*, London: Printed by John Haviland, 1622, pp. 530-531.

⑦9 William Gouge, "Of Objections to Good Manner," in *Of Domestic Duties*, pp. 531-532.

⑧0 George Pettie trans,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Steeven Guazzo*, London: Printed by Richard Watkins, 1581, p. 31-v.

⑧1 Peter Burke, *The Fortunes of the Courtier: The European Reception of Castiglione's Cortegiano*,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9-110.

⑧2 George Petti, "The Preface to the Readers," in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Steeven Guazzo*, sig. Iv.

⑧3 Haly Heron, *The Keyes of Counsaile*, London: Printed by Ralph Newberie, 1579, pp. 29-30.

⑧4 关于对欧洲思想家对宫廷礼仪表里不一和系统性作伪的批判,参见 Sydney Anglo, *The Courtier's Art: Systematic Immorality in the Renaissanc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Swansea, 1983。

⑧5 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在线语源词典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dissembler>,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0日。

⑧6 Steve Hindle,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50-1640*,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p. 176-177.

⑧7 S. N. James, "Cardinal Wolsey: An English Cardinal Italianate," *Renaissance Papers*, 2008, p. 6.

⑧8 "Henry VIII: September 1534, 6," in James Gairdner ed.,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Henry VIII*, Vol. 7, 1534, London: Published by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83, p. 446; Peter Burke, *The Fortunes of the Courtier*, p. 96.

⑧9 Joan Sim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Tudor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339-340.

⑨0 John R. Woodhouse, "The Tradition of Della Casa's Galateo in English," in Carré ed., *The Crisis of Courtesy*, pp. 13-14.

⑨1 William Fiston, *The Schoole of Good Manners*, London: Printed by Danter, 1595, sig. C3r.

⑨2 这一情形长期延续,时至今日西方儿童礼仪书中也会强调外在与内在和谐统一。见 Emily Post, *Etiquette in Society, in Business, in Politics, and at Home*,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22, pp. 1-2。

⑨3 S. L. Collins, *From Divine Cosmos to Sovereign Stat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Idea of Order in Renaissance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

⑨4 刘新成:《“乡绅入侵”:英国都铎王朝议会选举中的异常现象》,《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⑨5 Law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

16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85.

⑨⑥ Charles Knight ed., London, Vol. 1,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41, p. 378.

⑨⑦ 林美香:《身体的身体:欧洲近代早期服饰观念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58页。

⑨⑧ 李新宽:《试论近代早期英国奢侈消费的下移》,陈晓律主编《英国研究》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8页。

⑨⑨ Henry Peacham, *The Art of Living in London*,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Gyles, 1642, sig. A2r.

⑩⑩ Norbert Elias, "Diminishing Contrasts, Increasing Varieties," in Stephen Mennell and Johan Goudsblom eds., *On Civiliz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 67-69.

⑩⑪ Keith Wrightson, "'Sorts of Peopl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Jonatho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 eds., *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550-18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pp. 38.

⑩⑫ Thomas Smith, *De Republica Anglorum*, A Discours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L. Alston e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4, pp. 39-40.

⑩⑬ "A Third Letter of Harvey to Spenser," in A. B. Grosart ed., *The Works of Gabriel Harvey*, Vol. 1, New York: AMS Press, 1966, pp. 136-137.

⑩⑭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p. 68.

⑩⑮ Thomas Elyot, *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 STC 7636, p. 106.

⑩⑯ Jorge Arditi, *The Genealogy of Manners*, p. 170-171.

⑩⑰ George Pettie trans,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Steeven Guazzo*, bk. 20, p. 31.

⑩⑱ Philibert de Vienne, *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urt*, London: By Henry Binneman, 1575, pp. 59, 100.

⑩⑲ Philibert de Vienne, *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urt*, p. 108.

⑩⑳ Francis Bacon, "The Second Book of the Proficienc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in James Spedding et al ed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45.

⑩㉑ Keith Thomas,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25-226.

⑩㉒ Della Casa, *The Refin'd Courtier, or a Correction of Several Indecencies crept into Civil Conversation*, trans. by

Nathaniel Walker, London: Printed by F. G., 1663, p. 95.

⑩㉓ Francis Bacon, "The Second Book of the Proficienc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in James Spedding et al ed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3, p. 447. 译文参考培根:《学术的进展》,李运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⑩㉔ James Cleland, *Hero-Paideia, or the Institution of a Young Noble Man*, London: Printed for Joseph Barnes, 1607, p. 179.

⑩㉕ 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London: Printed for A. and F. Churchill, 1693, p. 156.

⑩㉖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27页。关于修辞方法对德性弱化的影响参见 Quentin Skinner, "Moral Ambiguity and the Renaissance Arts of Eloquence," in *Visions of Politics: Renaissance Virtue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64-285.

⑩㉗ 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p. 168.

⑩㉘ 以上两段引文在洛克1692年首版《教育漫话》中没有出现,应当是后来增加的。该书第66节大量增加关于“矫揉造作”正当性和“行为与思想不可能一致”的看法,从侧面可见此问题的时代紧迫性。引文参见 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R. H. Quick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2, pp. 40-42.

⑩㉙ George Pettie trans,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Steeven Guazzo*, bk. 1, p. 22r-v. Henry Peacham, *The Compleat Gentleman*, pp. 7-8.

⑩㉚ Quentin Skinner, *From Humanism to Hobbes: Studies in Rhetoric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71.

⑩㉛ David Starkey, "The Court: Castiglione's Ideal and Tudor Reality; Being a Discussion of Sir Thomas Wyatt's 'Satire addressed to Sir Francis Brya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45(1982), p. 239.

⑩㉜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399页。

⑩㉝ 卡斯蒂廖内:《廷臣论》,第122页。

⑩㉞ Paul Langford, "The Uses of Eighteenth Century Politenes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2(2002), pp. 311-331.

⑩㉟ C. S. 路易斯:《论平等》,《切今之事》,邓军海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5页。

⑩㊱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